



科工要学院802 2 0008645 1

孙子兵法释义

(增订本)

朱 军 著

23325

海潮出版社

1992年·北京

责任编辑:胡忠林

封面设计:符晓笛

封面题字:武中奇

孙子兵法释义

增订本

朱军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25印张 229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54-246-7/E·22

定价:5.65元

初版序言

一、孙子兵法是一部世界军事名著

《孙子》成书于我国春秋时代末期，在历史上作为兵经流传于世，为历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所必读。公元 735 年此书传到日本，也为日本历代军事家所推崇研究，且造诣较深。公元 1772 年孙子兵法传至法国，接着在西欧传播开来。德皇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读到孙子兵法后说，恨读此书太晚。现在虽然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武器装备和运载工具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使战争的情景进入崭新的时代，然而孙子兵法所阐明的许多军事理论原则，并没有显得过时。美国是当代的军事大国之一，他们把孙子兵法列入“国家战略”课程，其陆军自高级将领到普通军官都很重视学习孙子兵法。当代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战略论》一书的扉页上选列了“军事家语录”计 21 条，其中孙武的语录就有 15 条，并排列在首位。美国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一书的代序，以“公认的战略创新者”为标题，把孙武列在第一位。他写道：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 2200 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

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确实，孙子的战略思想原则包括他研究战争的观点、方法，对于指导现代战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第一个注释孙子兵法的人是曹操（公元 155～220 年）。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要旨，故撰为略解焉。”（转引自吴汝嵩：《孙子兵法浅说》第 5 页）。

曹操既高度评价了孙子兵法：“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理论意义，也批评了后世的学者未能“深亮训说，……失其要旨”，即没能深透明白孙子兵法的一些精神实质。恐怕这就是最近有人说的我国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落后于外国同行的原因吧！

《孙子》成书于 2400 多年以前，今天所以仍为军事家所尊崇，而且它所阐明的理论原则的影响已超出了军事领域，这是因为它对战争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找出了战争的最一般的基本规律，并确立了关于战争的理论观点。孙武为什么能够如实地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有正确的哲学思想。

二、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武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军事思想家；但从孙子兵法考察他认识战争、分析战争、发现战争规律所使用的观点、方法，可以看出孙武是具有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和运用了早期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方法的，是有正确的哲学思想的。孙武当时能自发地运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诸子百家各立思想学说，是思想家百家争鸣的非常活跃的时代，其中就有代表新兴地主

阶级的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这是孙武接受先进思想的客观原因。二是孙武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地形篇的“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段话，就反映出孙武的这种崇高精神。这是他能够接受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观原因。大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真正埋头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而忘我的人，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以及自然界的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才能够运用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方法。许多历史事实能够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当然，孙武的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那时还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哲学思想体系，所以远远不能同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相比拟。也就不奇怪孙武在某些问题上还暴露有唯心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来检验一下孙武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按其本身来说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认为物质、自然界的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从孙子兵法中不难看出，孙武的军事思想反映了上述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例如：他把战争看作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即所谓“兵者，国之大事”（计篇）。他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并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要求作战必须先知敌情；而先知，不能靠迷信鬼神和卜筮，必须依靠人去侦察（用间篇），通过“五事”、“七计”的对比可见胜负。提出了“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

政”、“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将有五危”(九变篇)、败道有六(地形篇)，不可不察的论点，并归纳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至理名言。这些论点都说明战争规律是可知的。此外，在考察战争活动时，他不是把战争情况看作是静止的，而是把它看作不停顿地变化着的。由此可以看出孙武是运用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来看待战争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孙武研究战争这一社会现象运用的不是唯心辩证方法，而是唯物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1)各个对象或现象是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2)辩证法把自然界看作是不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3)辩证法把发展过程了解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从旧质态向新质态的转化……(4)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这种对立面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参考《联共(布)党史》第4章第2节)。

根据马列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我们看到：

第一，孙武不是把战争——准备和实施——这一社会现象看作是孤立的，而是看作与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就是在某一战争中，对立双方每一方面的“道、天、地、将、法”这五种与战争胜负有关的基本因素，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直至构成战斗力的各种要素的存在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第二，孙武把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不看作是静止的，而看作是不停顿地运动变化着的。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势篇)对立的双方在战

争中都是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智力进行争胜，都是按照“知彼知己”、“因敌制胜”的原则，互因互变，变化不止。孙武在《虚实篇》用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无常胜的规律，说明战势的变化。在《九变篇》专门论述了知常知变的道理。

第三，孙武不是把战争情况的变化看作是简单的数量增减，或简单的位移，而是看作发展过程中的运动变化。这倒不是说作战行动没有进退的位移。进者因战况有利于己是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退者则因战况不利于己向着避战、守势方向发展。即便是某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拉锯战，从外表看是位移，实际是内部发生变化，而且战争形势的每次得失、失得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孙武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致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篇）这“不复”与“无穷”，就说明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发展。

第四，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以敌我这对矛盾作为战争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论述了存在于敌我之间的各自内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如众寡、奇正、虚实、利害、攻防、进退、强弱、刚柔、迂直、远近、劳逸、轻重、深浅、先后、隐显、动静、勇怯、静哗、死生、饥饱、前方与后方、侦察与伪装、主动与被动、速决与持久等矛盾范畴，在战争中时刻通过敌对双方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展开着斗争与转化的论述，在十三篇中实不少见。这些矛盾的斗争通过量变达到质变，打败敌人，赢得胜利。

第五，孙武在考察战争时，主张透过表面现象看战争行动的实质。如在《行军篇》相敌部分，就讲到料敌的一般规律，以及因形见情的道理。

由上可见，孙武是把战争看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充满着矛盾和矛盾的斗争、转化与发展的。所以他的观点是朴素的辩证

唯物观点，他的方法是早期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方法。

正因为孙武思想的主导方面有正确的哲学思想和正确的方法论，所以能够客观地认识、分析战争的规律，而他通过揭示这些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理论原则及其方法论，其作用无疑会超出战争领域，而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里被广泛运用。

三、孙武在战争理论方面的成就

第一，孙武揭示了武装力量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兵者，国之大事”，便是指的这件事情。其次，他还承认政治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把“道”，令民与上同意，即得到人民广泛拥护的比较开明的政治，摆在“五事”的首位。在计算胜败的可能性时，又把“主孰有道”作为第一个应考虑的因素。有道的战争意味着是正义的战争。为着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修道而保法”（形篇）。要动员人民从事征战，还有赖于平时进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的教育管理，而且各级领导都须亲身在遵令守法方面带头起模范作用，即孙武说的“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民相得也”（行军篇）。与民相得，就能“和于国，和于军”（《吴子兵法·图国》），就能举国一致，军民团结，全军团结。

第二，孙武的战略思想超出了军事的战略范畴，包括了政治战略。在古代，虽然政略、战略、战术在观念上随着战争的产生已经存在，但还不能有科学的划分，没有这些名词，古代兵书包括《孙子兵法》也没有明确它们的界限。但不能说不存在这三种概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都是政治斗争战略的范畴，因而确立了“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思想。“全争”就包括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

外交的、文化的、科技的等等各条战线上的斗争。由此可见，孙武是把战争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尽管它是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形式和重要手段，但决不是唯一的形式和手段。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其他各条战线的配合。毛泽东同志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斗争形势，完全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性。政治是除武装斗争以外的所进行的各条战线的斗争，而所有的斗争又围绕着或准备着武装斗争。所以可以看作是战争。战争则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时，也进行着其他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就包括着这两方面。“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就是开展外交斗争。孙武在 2400 多年前就揭示了战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

第三，孙武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首先，战争的进行须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即所谓“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具备了这些物质条件，“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反之，若没有这些物质器材和经费作基础，就不能举十万之师。其次，战争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内外骚动，急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篇）；“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胜贫”，“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作战篇）。都说明战争对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战争离开了物资供应便不能进行。因此，孙武提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作战篇）的原则，以节省国家的人力物力。为着贯彻这个原则，他提出“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九地篇）的在敌国强行征粮的办法，以实现

“重地吾将继其食”的重要的粮食补给思想。再是他重视以虏获的人力与武备来补充自己的部队。“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作战篇)的主张，是“胜敌而益强”的措施。由此还看到了孙武的善待俘虏的思想。既然物质基础对战争影响如此巨大，所以他主张战争又以破坏敌人的物资器材作为战斗目标，火攻篇提出的“火积”、“火辎”、“火库”，便是为着实现破坏敌人的物资补充这一战斗目标。现代，用于火攻的兵器更先进，用火攻破坏敌人的战斗行动规模更大了。

第四，孙武根据对战争与经济所进行的分析，确立了速决战的战略思想。“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即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战争是敌对双方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相反相成的作战活动，彼此间的利害是相对的。如“速战”，对甲方有利，为甲方所希望的，而恰是乙方所不希望的，因为对乙方不利。此时乙方将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迫使敌人违背自己的意志，陷于持久战，最后乙方赢得了战争。这是战争的特殊规律。尽管孙武没有讲持久战之利，根据孙武的利害观考虑战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殊规律的存在。

第五，孙武主张慎重开战，确立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思想。火攻篇末段写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孙武提出的必须慎重开战的警句。他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非利不动，”作了补充说明。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孙武非常重视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战争。“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还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作为有准备和无准备的比较。

“措”字就包括战前的组织准备、周密计划和战争过程中的举措得当。“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这类似战前根据作战计划进行的图上对抗演习，以检验战备计划的有余或不足而再准备。这也正说明必须依靠平时进行必要的准备。《火攻篇》提出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命曰费留”，就是讲的若期望战争致胜、能有所得，而在平时不进行高质量的准备工作，是很危险的（凶），这是浪费国家财产，是思想保守，不求进取的表现。再次说明国家领导人千万不能疏忽国防建设。

第六，孙武非常重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但同时阐明“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篇）的观点，说明他认为在战争中地形与部队比，军队的战斗力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任何战争都在一定的空间、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战争，有其不同的自然条件，对战争行动有不同的影响。孙武对地理条件反复详尽地加以论述，不仅讲到自然地理对作战的影响，而且讲到人文地理对政略战略的影响。但地理形势的优良可以有助于战斗力的发挥，地形本身并不具有战斗力，具有战斗力的是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军队良好的军政素质。

第七，孙武阐明了对敌军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欲求战争的胜利必须“知彼知己”，因此先知敌人的情况是重要前提。在十三篇中孙武多处提出知敌的重要性，所以把“用间”列为专篇进行阐述。“间”从字义上讲就是利用敌人的各种空隙进行工作。它包括对敌人进行争取、分化、瓦解、破坏工作和情报工作。也是“全争”的工作内容之一。

第八，孙武认为军事行动的保密至关重要。“兵者，诡道也，……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

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篇）。“事莫密于间”（用间篇）。这都是讲情报、兵运等间谍活动是军队机密中最机密的工作，都是讲严守秘密，隐蔽意图，使敌莫测的论点。同时，孙武也很注意伪装佯动，调动敌人。

第九，孙武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避实击虚，迅猛突然的作战原则。战斗力的表现，从来是威力加速度。孙武对此以两个生动的比喻：（1）“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篇）；（2）“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来说明“兵之情主速”（九地篇）的原理。就是说在战争中兵力的运用应该是积蓄（集中）力量，避实击虚，迅猛冲击。

第十，孙武确立了敌我这对矛盾中的主导方面是我而不是敌。孙武重视主观努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形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都是说明靠自己有实力，有准备，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挑衅进攻；否则，敌人就敢来。因为兵形象水，避高趋下，避实击虚，这样在战争中保持主动和进行正确而迅速的机动，是取胜必须具备的条件。“致人而不致于人”，“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篇），是讲保持主动性的问题。“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势篇），说明部队具有机动性，便可不致失败。

第十一，孙武确立了战争的全局观念和密切协同的原则。“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

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用“蛇”来比喻战争的整体（全局），以首、中、尾比喻战争的各个局部；任一局部遭到敌人的攻击，则与之有关的各部队均应主动去支援，就是密切协同。为着做到良好的协同，孙武在引用《军政》的话“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之后说：“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军争篇）。指出用众兵作战必须密切协同，步调一致。各部队应按信号所示指挥员的命令采取行动，则是协同的要旨。当然，协同的密切有赖于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和高超的训练水平，还须有牢固可靠的周密的通联设备和通联组织保证。

第十二，孙武正确规定了将帅在战争指导中的主导作用和重要责任。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举一艘将沉没的轮船为例说：“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战争，从来就是出生入死的危险活动，它片刻不能离开在具有权威的将帅领导下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孙子兵法强调将帅的作用和职责，是符合战争的要求的。孙武提出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可以看作是要求将帅应有的最高修养。这一要求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第十三，孙武以全面的观点论述了战争行动的利害观。他说：“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则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强调要深刻懂得用兵的利害两个方面，要善于趋利避害。

第十四，孙武深刻地揭示了战场心理活动。他说：“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又说：“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篇）。这都是依据部队在战场上人们的心

理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孙武对战场心理的论述,为后世战场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孙子兵法每篇都有丰富的内容,它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基本规律。上述十四点不可能概括其全部思想内容,只是列举一些要点。

当然,孙武因时代环境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性,未能识别战争的政治性质。从孙武的战争理论看,他的哲学思想还掺杂着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他提出了战争对政治、经济的依赖关系;但未能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更未阐明战争可以创建新政权的作用,尽管在他以前曾有过汤、武革命建立商、周王朝的历史。在经济上也未能阐述反动的战争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战争则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未能解释清楚战争的根本目的——实现政治主张。也可能有人说,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经济问题,但应该注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其次,孙武突出强调速决战的优点,确立了速决战的思想,但这只是一般战争规律,未能论述持久战也能取胜的特殊规律。

其三,关于攻防问题。孙武提出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以及“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可胜者,攻也”、“不可胜者,守也”(形篇)等攻、守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未能揭示攻防互相为用、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从而未能阐述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

其四,孙武提出的“散地则无战”,有正确的一面——即采取守势作战。但对“散地”——本土作战的优点估计不足,如部队熟悉地形,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具有物资供应的便利条件等。他只说士兵离家近,容易逃散。这说明孙武只看到了士兵的消极情绪,而没

有看到士兵保家卫国、爱人民、爱民族的积极情绪。

其五，孙武确立了使用优势兵力对敌作战的思想，提出“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以及弱不能敌强。这作为战争胜败的一般规律是正确的；但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上的多寡、强弱，只是因素之一。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也不少。孙武对这一点论述不足。

其六，孙武把地分为死地生地，并说“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地之死生是相对的，是变化的。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对地形这一自然条件给予限制的克服，死地也可变成生地。例如，当人类还不能克服海洋这一障碍的时候，海洋便是死地。当人类发展了造船工业，海洋被征服了，海洋就变为生地了。对于天空、外层空间，都应这样看待。苏联的“台风”级核潜艇，拥有20个导弹发射管，可发射的导弹射程达8300公里，能在北冰洋的冰下活动。说明这种潜艇已经克服了北冰洋这一自然条件的障碍。人们懂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去征服当前还是“死地”的某些地区。

由于孙子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还存在类似上述的一些缺陷，所以在学习这部兵法时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吸取其精华以为今用，剔除其糟粕，弥补其不足，使祖国的经典兵学放出新的光芒。

四、孙子兵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领域广阔，实践性强。它包括了：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战略战术、军

队政治工作和武装力量的组织体制；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全面斗争；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支援长期革命战争，等等。它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思想、理论的最高成就，远非孙子兵法所能及。对于孙子兵法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异同，仅有以下几点粗浅体会：

（一）孙武生活在 2400 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末期，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孙武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的，但那时人们的阶级意识还没达到自为阶级的程度，所以反映在孙子兵法中的阶级思想并不明显。毛泽东处在历史上最进步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长期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曾说过的，我们的战略战术敌人是知道的，但他们学不了去，原因就在于军队的阶级性质不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这是两者的差异。

然而，孙武在春秋末期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制度问题上处于进步势力的一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代表着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在推翻人剥削人的旧制度中也是处于最进步的势力的一方。所以虽然两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但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都代表着进步思想，这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

（二）在历史上，凡代表时代的进步力量和进步思想的人，在他们反对和推翻旧的反动统治势力时，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和认识，总是比较客观地追求真理，一般能够运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所谓正确的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观点和唯物辩证方法。孙子兵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孙武受着时

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只能基本上运用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和早期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所提出的某些理论原则表现有唯心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像前边所列举的那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毛泽东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准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结果。因此，他能全面地、深刻地揭示战争规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三)在战争依赖广大人民群众问题上，孙武提出的开明的政治，取得人民的拥护，是争取胜利的首要因素。他说的“修道保法”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令民与上同意”的“令”字看，孙武又是站在统治人民的方面去“令民”。毛泽东重视人民在战争中的威力，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由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在战争中不仅广泛地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而且也博得敌战区人民的赞扬，并殷切期待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由此可见“令民”与“为民”的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个不同的阶级观点。一个是在人民之上，一个是在人民之中，后者较前者更具有积极性。沿着前者的思想路线发展到现在，形成了资产阶级军事学说中的“总体战”思想；按照后者的思想路线发展，则形成了“人民战争”思想。“总体战”和“人民战争”并不是一个思想体系，这是我们应该分清的。

(四)关于进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战争，一定要有其他斗争形式来配合问题。孙武提出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的论断，说出了他的全面斗争的思想。他还说：“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